



清代刻本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书影。资料图

快哉东坡·海外集



北宋哲宗绍圣四年(1097年),年已花甲之年的苏东坡再遭贬逐,由惠州迁至当时的“海外蛮荒”之地昌化军(儋州)。在这“非人所居”(东坡之弟苏辙语)之地,东坡熬过三年的艰难岁月,生还海北,而且还“食芋饮水,著书以为乐”,为后人留下了各体文章、诗词等达数十万言,计有诗词赋颂碑铭尺牍杂记表论近三百篇(首)。

海外作品,生前未能结集

苏东坡在海南创作的诗文词赋,生前未能亲自编订结集。他去世后,曾有友人欲将这部分海外作品收集整理成帙,名曰《南浮集》,但未曾实现。

至今所能看到的《海外集》《居僊录》,都是明清以后,地方郡守或绅士学者据当时所能获得的资料整理编辑的。如明万历间儋州知州陈荣选所编《苏文忠公居僊录》、万历四十七年琼州督学戴燿所编《苏文忠公居僊录》、清康熙年间临高知县樊庶所编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、清乾隆年间琼山举人王时宇所编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、清光绪年间儋州学正刘凤辉所编《居僊录》。

这些版本限于当时资料欠缺,编纂都够不上精审,除了误收不少非东坡海外之作外,所收入集的作品也每见舛误,与东坡原作有别,而实为东坡海外

所作却又遗漏不少,难称善本。

基于以上原因,20世纪80年代以前,东坡海外诗文一直未引起国内苏学界的关注,而岛内的苏学研究更是一片空白。1980年9月,全国苏轼研究会在四川眉山成立,笔者以《苏轼与儋县文化》一文应邀出席并参加了首届研究会。此文后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《苏轼研究》专刊上。

1990年代初,笔者据现代资料所得,在前辈整理编纂的基础上,经过一番考证搜集,审慎甄别并详加注释,于1992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了《新编东坡海外集》一书,至今已再版四次,最后一次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再版。

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苏学专家朱靖华先生曾著文称赞拙著:“力挫有宋以来的种种陈说,独逞妙思,是一部颇富学术价值的著作。”

诗风转向平淡朴实

《新编东坡海外集》所收作品,以诗作为多,而这些诗作中又以“和陶诗”居大半。东坡晚年盛赞陶诗的艺术造诣,称陶诗“质而实绮,糅而实腴”“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实美”。基于这样的审美观,东坡坦然道:“吾于诗人无所甚好,独好渊明之诗。”

居僊期间,他几乎将陶诗追和了一遍。后世学者认为,这实质是东坡在创作上的又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。谁都知道东坡是公认的“豪放派”大诗人,但他

晚年勇于创新,在结合自身遭遇时,深刻认识到陶诗的美学价值,转而大胆革新,创造出陶诗式的“平淡朴实诗风”,给后世诗坛又树立了一个全新的诗歌范式。

同时,他在谪琼居僊期间,在充分吸收陶诗的美学营养时,也创作出不少保留其特点的名篇。如《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》《夜烧松明火》《僊耳》《澄迈通潮阁》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等,均脍炙人口,令人难忘。

处天涯之远,不忘忧国

除诗歌外,东坡的海外作品,最值得关注的还有“海外十六论”。如果说,海外诗是东坡贬谪生涯的纪实,这十六论则是东坡“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”的忧国之思,每一论都非“坐而论道”的空谈而是针对北宋的政治现实,一事一议,力求有补于治国之道。如《论周东迁》一篇,以周平王迁都为例,深刻地指出:“其余避寇而迁都,未有不亡;虽不即亡,未有能复振者也。”这就是说,如果因害怕敌国强大而迁都,则没有不亡国的,即使暂时不亡,也没有能重振其疆土者。东坡果然不幸而言中。在他去世后将近三十年,由于徽宗、钦宗畏敌如虎,主张南迁,结果导致北宋亡国,此后再也不能复国。“十六论”明显保留着东坡前期政论文风中博辩、宏肆的风采,但议论更为沉着,观点更为凝练。

东坡海外集中大量关于海南地方风物、气候、民俗、物产、医药等的记述,已经成为后世研究海南的珍贵历史文献。而集

中的许多杂记、书信、碑铭、词赋等,都各有风采,充分保留了这一伟大文学巨匠高超的、处于巅峰状态的写作技巧与创作风格。如《黎檬子》,系怀念故人之作,短短百余字,从故人的一个绰号写起,一下子就使人对这位故友有了难忘的印象,情文并茂,字无虚设。又如《书柳子厚(牛赋)后》,这是作者劝俗之文,因当地土人“以巫为医,以牛为药”,“杀牛以祭鬼”,迷信害人,使作者十分痛心。对牛的不幸遭遇及“人牛皆死而后已”的不幸结局表示了深切的同情。全文以辅述为主,却十分精当,紧紧围绕牛和医这一中心,不枝不蔓,而且又显得曲折有致。此外,《刘贡父戏介甫》之明快辛辣,《食蚝》之豪爽诙谐,以及大量有关风物土产的文字,大都写得准确生动。

东坡以一个文学大家的形象耸立在历史的旷野之上,但前人对他的推崇与爱慕,并不止于文章,而首先是他的道德和人品。晚年谪居海外,使其节操和品德的光辉烛照世人,赢得了更广泛的尊敬。

一部集子

内心恬淡 忧国忧民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



清康熙年间刊行的《海外集》中的晚年苏轼画像。乔红霞提供

完成海外『三书』 阐发人本思想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

在海南,苏东坡除了文学创作不辍,还覃思竭虑完成了三部学术巨著《东坡书传》《东坡易传》和《论语说》,共数十卷。可惜由于北宋末年的党争,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,在东坡生前都不能公开刊行,只能以手抄本流传于民间。

东坡在海外完成“三书”的写作后,曾对友人说:“所喜者,海南了得易、书、论语传数十卷,似有益于腐朽后人耳目也。”北归后,临终前他犹不忘嘱咐好友钱济明:“某前在海外,了得易、书、论语三书,今尽付与子。愿勿示人。三十年后,会有知者。”因为当时他正处于政治漩涡之中,政敌随时加害,所以东坡只好将倾尽心血之作托诸好友,并有“藏之于人,传之不朽”的自信。

他在完成三书之后,撰文称:“大哉人乎!易曰:‘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。’吾作易、书传、论语说,亦粗备矣,呜呼,又何以多为?”东坡的意思是,一种思想,一种理论,只有存在于人们普遍的长久的思想意识里,才能流传不朽。

他在海外三年精研《尚书》,悟出了“以人为本”的治国之道。因而在《东坡书传》一书中,其一以贯之的“民本意识”是历朝历代的《尚书》传注者们所未能达到的思想高度。可以说,《东坡书传》旗帜鲜明地宣扬“以德治国”“仁政爱民”“富民强国”的王道,而坚决反对“虐政害民”“弱民强国”“食民自肥”的霸道。

《东坡易传》(此书写于谪居黄州时,包含着其父苏洵、其弟苏辙的部分创作)同样贯穿了“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”的“以人为本体”的哲理。

《东坡易传》与《东坡书传》一样,均具有与北宋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相联系的进步意义。

东坡《论语说》共五卷,初写成于东坡谪居黄州时,最后完稿于海南。此书北宋未曾一度遭禁绝,后又复传,直至明万历年间失传,今《四库全书》未见著录。

《论语说》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充分表现出东坡能独立思考、集思广益、不为现成结论所左右的治学态度。因此,《论语说》有许多精妙独到的诠释,为后人所折服,连朱熹在其《论语集注》中也多处引用。

但《论语说》因为失传已久,今人所能见到的是前人不断辑录完善的本子,仍是后世学者所乐于辑佚钩沉的杰作。